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先变中国东北为它的殖民地，进而征服全中国、征服世界的基本国策，由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经过精心设计的“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沈阳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发起突然袭击，侵占了中国东北。这就是后来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九·一八”事变。

一、大陆政策与《田中奏折》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社会制度腐败、内部四分五裂、蒋介石引狼入室的不抵抗政策等自身的原因外，主要还是取决于日本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本性。而所谓“军国主义”，概括地说，就是以大肆扩张军备和对外侵略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国策，而且国家的一切政策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服务于这一目的的。纵观日本近代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对外进行军事侵略、残酷掠夺的历史，而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只不过是其既定侵略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而已。这正如日本近代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所说：“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像日本这样从来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而且战争之间很短促的间歇也主要是为了消除上一次战争的后果和准备下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除日本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

日本之所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日本的封建武士是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些封建武士有两大基本信条：一是认为日本是天下万国之本，妄想征服世界、统治世界；二是崇尚武力致胜，相信武力是立国的基础，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所谓“武士道”精神。这些武士以对内对外的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无尚光荣。认为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国防的目的和本质就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就确定了一条露骨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开始制定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扩张政策。这项后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政策，始于早期的日本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大军阀——山县有朋。1879 年，日本当时的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为了刺探和掌握中国的军备与政局情况，以制定相应的对华方针政策，即秘密派遣以桂太郎为首的 10 余名军官到中国的华北地区，在北京、天津等地进行探查，并起草了对华作战方案。第 2 年，山县有朋又派了 10 多名“中国语研究生”，到中国进行调查活动。根据这两次调查的结果，编写成了详细论述中国军备情况和日本侵华行动方针的《邻邦兵备略》。山县有朋还为此专门写了奏折，于同年 11 月 30 日，一起上奏明治天皇。这对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随着山县有朋先后出任首相、陆军大臣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本性，日本的大陆政策便逐步形成。这从山县有朋的一些言论中看得很清楚。他在 1890 年 3 月在呈给天皇的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1895 年甲午战争结束后，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关于《陆军兵制改革奏议》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他说：“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之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

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山县的意思很明显，是说过去的日本只是以武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线；而现在的日本，已经强大起来，可以保卫其利益线了。此外，山县有朋 1918 年提交给寺内内阁的一份建议书中还强调说：“未来我国利权之扩张方向应为中国”，“帝国与中国之地理位置、国际关系，优于其他各国，向中国扩张国权、增进我国之利益，必然是十分有利的。”这里所说的“利益线”，是指同日本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利害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日本军国主义认为同它有利害关系的地方，它都要用武力去“保卫”。而中国、朝鲜等大陆地区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山县所说的开辟、保护利益线，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侵略政策，就是后来作为其根本国策的“大陆政策”。这一“大陆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用武力征服中国和朝鲜。其步骤是：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大体上是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热河指现在的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的范围）；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期征服全世界。

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确定和形成大陆政策的同时，即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军事侵略。1894 年至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更是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随后，日本军国主义更是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各种侵略活动，而且其侵略的重点也更加明显，这就是直指中国的东北。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继承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随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贯彻实施其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巩固其侵略成果，即开始积极策划进一步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从 1906 年起，日本先后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了一系列的侵略机构，其中主要的是“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关东都督府”（1919 年起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以及日本驻奉天（今沈阳市）总领事馆。这些机构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得力工具。

1905 年日本虽然打败了沙俄，夺得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取代了沙俄的地位。但当时从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实力及其它各方面情况来说，日本还不可能独霸东北，还需要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1906 年“满铁”便应运而生。继“满铁”设立后，日本为便于对东北的统治，紧接着又建立了关东都督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主要负责管理东北地区的行政及军事事务。后来，为了协调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日本决定废除关东督府，将原来的都督府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但基本职责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1919 年 4 月 11 日，以陆军第 12 号军令的形式，发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条例》，正式建立关东军司令部。按照规定，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大将或陆军中将担任，直属日本天皇。关东军自成立之日起，就成为日本设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最重要的侵略工具。在随后的数年内，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了一系列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事件，如 1919 年 7 月的“长春事件”、1928 年 6

月 4 日的“ 皇姑屯炸车事件 ”、“ 1931 年 7、8 月的“ 万宝山事件 ”和“ 中村大尉事件 ”等，都是由关东军一手策划和实施的。特别是 1925 年 11 月 23 日，受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影响的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挥兵直指奉军根据地——奉天。在张作霖处境危急的时候，1925 年 12 月 25 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调遣驻朝鲜龙山的日本侵略军，在关东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下，至奉天帮助张作霖，打败郭松龄军。结果郭松龄兵败被杀。事后，日本人即利用这一机会，开始大量增加关东军的数量。从而，使日本的关东军成为一支实力颇为强大、不容忽视的军事集团。

1927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 东方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大将、陆相白川义则等军政要员，会议共举行了 11 天。这次会议除正式议程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秘密议程和秘密活动，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确定对华政策，中心议题是关于日本的所谓“ 满蒙政策 ”。因此，这次会议完全是田中义一为了制定新的更加积极的对华、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者森恪，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扩张主义者。在会议之前，他就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商定了“ 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 ”的方针。森恪的主张和首相不谋而和。所以，这次会议除了强调东三省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中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外，就是提出“ 对于满蒙的主权，日本也有参与的权利。 ”最后形成了一个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扩大侵华方针的《对华政策纲领》。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落实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森恪又在同年 8 月 13 日，在中国大连召开了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参加的“ 大连会议 ”，又称“ 第二次东方会议 ”。这次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在东北，凡是与日本利益有冲突者，日本都要干涉。

“ 东方会议 ”结束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又将会议所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了一个秘密文件，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并于 7 月 25 日上奏日本天皇。这就是后来人们广为传说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与后来发生的“ 九 一八 ”事变关系密切。中译本约有二万四千字，分为二十项内容。主要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和称霸世界的总战略。它露骨地提出：“ 按明治大帝的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均已实现。唯第三期之灭亡满蒙，以便征服中国全土。然后再利用中国的资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还有待于继续努力…… ”。因此，“ 欲征服全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就必须先征服满蒙 ”。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目标并不仅仅限于“ 满蒙 ”和中国，而是整个亚洲乃至于全世界。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特别是对中国东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吞并和全面侵略活动，可以说既是出自《田中奏折》又是完全按照该奏折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的。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等4省，总面积约113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日本国土的3倍多，比法国和德国的面积之和还要大。它的东面和东北面隔乌苏里江、黑龙江与前苏联为邻，又临渤海、黄海与日本隔海相望。东北是我国自然资源的宝库。铁、煤、铜、铅、锌等矿产都十分丰富集中，当时东北地区生产的石油占全国总产量的93%，冶铁量占73%，黄金开采量占55%，铁路线占41%，另外森林面积达1800万公顷，占全国的1／3。这对于资源贫乏而又富于侵略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极具诱惑。因为东北既是它的一个原料资源丰富、地理条件方便的供应地；同时，对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工业来说，中国东北又是它的一个重要市场。东北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本身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板垣征四郎，在1931年3月所写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一文中这样说：“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龙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众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由此看来，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国东北当作一块求之不得、咬住不放的大肥肉。

二、皇姑屯炸车事件

“东方会议”确定独占“满蒙”为最高国策后，日本关东军即制造了以炸死张作霖为目的的“皇姑屯炸车事件”，企图乘炸死张作霖、造成东北政局混乱之机，借口“维护治安”，出兵占领中国东北。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是由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扶植取得了东北的统治权，并于 1927 年 7 月带兵入关，与直系军阀一起掌握了北京政权，随着自己势力的逐渐扩大，他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为日本侵略的胃口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这直接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日本在“东方会议”后，即对张作霖提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的各种要求，而张作霖对日本人的要求，既不敢公开反抗，又不想完全听命，因而便采取了拖延的策略，这便引起日本的不满。

另外，在此期间，中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取得了南方政权。1928 年春，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举行北伐，向控制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强行逼迫张作霖答应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当蒋介石军队逼近北京时，日本政府于 5 月 18 日向蒋介石和张作霖同时发出备忘录称：现在动乱已波及京津地区，东北也有受其影响的可能。而维持东北的治安，是日本最重视的问题。如果现在动乱涉及到东北地区，日本政府将全力阻止，并将采取“适应措施”。这里所说的“适应措施”，就是绝对禁止蒋介石政府的军队进入东北，解除张作霖军队的武装，使张作霖成为只有仰仗日本人的鼻息才能生存的光杆司令。很显然，这是日本人对蒋张双方的警告。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开始向奉天集中，并沿京（北京）奉（沈阳）线向锦州、山海关出动，准备以武力占领东北。为了进一步向张作霖施加压力，日本公使芳泽奉田中首相之命，劝告张作霖收兵回东北，并威胁说：如不听劝告，那么东北军一旦失败而退回东北时，关东军将在山海关进行拦阻。在此情况下，张作霖被迫同意离开北京，率师退回东北。

就在芳泽劝告张作霖的同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等人策划的杀害张作霖的方案正在加紧准备。河本的方案是：当张作霖乘车回奉天时，在京奉铁路上炸车除掉张作霖。炸车地点本来选在巨流河铁桥，可当着手准备时，却发现该处奉军戒备森严，无法下手。于是便改在皇姑屯附近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桥洞处。负责执行这个计划的是日军独立守备队东官铁男大尉，他指挥由朝鲜调到奉天的日军工兵队在选定的铁路交叉处埋置了足够的黄色炸药，并在附近埋伏了一排日军。日军为防止在事先被人发现，在炸车事件发生的前 8 天，就在这一带设置警戒哨，不许行人通过。这种异常现象曾被当时的奉天城宪兵司令齐恩铭发现并电告在北京的张作霖，请张早做防备。但张作霖对这个报告未予重视。

6 月 3 日，张作霖及随从人员乘专列由北京出发回奉天，这时，派驻北

京侦察张作霖行踪的关东军参谋竹下义晴立即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当张作霖的专列通过山海关、锦州、新民等重要地点时，预先派遣的日军侦察人员，接连不断将专列通过的时间及地点准确地报告奉天。同时，为确保万无一失，南满铁路运行的火车全部停止。当张作霖的专车平安通过天津、山海关并于4日晨接近奉天时，车上的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以为不会出什么事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当专列于5时30分通过皇姑屯车站，行至南满铁路桥洞时，一声巨响，将张作霖所乘贵宾车厢和3节客车炸翻，张作霖被当场炸成重伤，还有多人被炸死炸伤。

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为掩盖事实真相，立刻调动工兵赶修被炸铁路，并处死2名中国人，在尸体上穿上国民党北伐军的衣服，伪造了“国民军东北招抚使”的3封书信，炸弹2枚，布置了一个假现场，声明经调查后确认是南方的便衣队搞的，以掩盖其阴谋。但是，“皇姑屯事件”是日本侵略者企图占领中国东北而制造的这一事实，是任何人也无可否认的。对此，该事件的直接策划者河本大佐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后，迅速被送到市内的帅府，但因出血过多无法挽救，在当天上午9时30分死亡。但因为担心张作霖死亡的消息传出后，日军会乘机发难，因而东北当局决定严守秘密，封锁消息，一切待张学良由北京回到奉天后再决定。

张学良在得知其父亲被炸死的消息后，立即化装潜回奉天处理后事。半月后在宣布张作霖死亡的同时，张学良出任奉天督办。7月4日，又宣布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此外，张学良还表明了国家统一的意向。

日本为了使东北完全脱离中国以达到其侵略之目的，在张学良就职后，即对张学良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措施。先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首相密令，三次警告张学良。在8月8日张作霖的葬礼上，日本政府派林为特使，又对张学良提出警告，并威胁说：如东三省与国民党政策妥协，影响到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日本关东军将采取“自由之行动”。张学良在强敌威胁下，一面与敌周旋，一面派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在国民党政府答应将热河省划归东北，每年拨东北军饷一千万元并任命张学良为国民党政府委员的条件下，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称：“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并在东北改挂“青天白日”旗。这就是历史上的“东北易帜”。张学良的通电，既表明了国家的统一，又表明了日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武装占领中国东北阴谋的破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促使日本人更加疯狂地进行战争准备。对此，“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河本大佐曾经打算乘炸死张作霖的机会占领满洲南部，但失败了。如果那次干得漂亮，后来的满洲事变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发动了。……从炸死张作霖事件中所得出的教训，是要制定周密的计划。考虑起来，那时的时机还是不成熟的。”花谷正的这段话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皇姑屯事件”，确实是为了制造出兵侵占东北的借口，只是由于当时的

主、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不过，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虽然从事件的本身看，具体参与制造“皇姑屯事件”的只是河本等少数人，但日本的许多军政要员都同这个事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岗长太郎，就可以说是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军政要员的指使和支持，没有“东方会议”所确定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最高国策”，河本等人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可能制造如此重大事件的。因此，“皇姑屯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

三、疯狂的战争准备

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物产，军事上的战略地位，早为日本侵略者所垂涎欲滴，因而在“东方会议”之后，即加快了以武力占领的步伐。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按照其“大陆政策”的总方针和“东方会议”所确定的侵华策略，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活动。

其中，为了“名正言顺”地吞并中国东北，日本人首先是千方百计地寻找侵占东北的“理论根据”，进行舆论方面的准备。而实际上这种舆论准备，早已随着“大陆政策”的形成而开始，在“东方会议”后逐步得到加强，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达到了高峰。在制造侵略舆论中，不仅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各个侵略机构特别卖力，就连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极右分子，也一齐出动。他们四处演讲，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散发传单，狂热地鼓吹各种所谓的“合法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制造占领东北的“合法性”，竟然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日本政友会头目、著名的极右翼分子——森恪公开宣称：“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蒙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蒙的领地。而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本土的十八省。本土的汉族对满蒙地区历来都是不关心的。以此来看，中国并不具有对满蒙的主权。”森恪的这一主张，不仅在日本各个阶层都有很大影响，而且还受到日本首相田中的赞赏。

第二，强调满蒙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认为满蒙对日本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之地区”。因此，一定“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第三，极力鼓吹武装占领中国东北。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决定要吞并东北，并已成为其基本国策的重要一环，但为了掩人耳目，在公开场合一般还是用“维护帝国在满蒙的权益”之类的外交辞令。而到了1931年上半年，就开始公开鼓吹武装占领的问题了。1931年1月24日，日本满铁调查科长佐多弘治郎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演讲时说：“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很显然，这就需要把满蒙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这里所说的“绝对权力的统治”，说穿了，就是军事占领之意，在这种近乎一边倒的舆论煽动下，日本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达到了新的高度。为了扩大影响，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9月7日，驻日本京都的第16师团第3飞行联队，竟然派飞机在日本的广岛、福冈、松山、富士山、金泽等地上空，散发十多万张传单。传单题为“醒来吧，国防！”其内容除了极力主张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外，还附有一张注有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的详细图解。

在日本人为吞并中国东北所做的各种准备中，军事方面的准备可谓是整出戏中的重头戏。为了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日本整个国家的工业体制全部转入战时轨道。另外，大规模的扩军备战需要资金的保障，所以尽管当时的日本财政已经很紧张，而且其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的比例本来就很高，但为了扩军备战和发动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人还是不断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军事预算。仅以 1930 年来看，日本陆海军的军费开支就占全年总收入的 27.8%，到了 1931 年则上升到 29.7%。而 1931 年军费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英国是 24%、美国 21%、法国是 22%、意大利是 24%。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名列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首位。“ 九 · 一八 ” 事变之后，为了保证战争需要，其军费开支更是逐年递增。详见下表：

日本陆海军军费开支表（单位：百万日元）

年度	总收入	陆军	海军	临时费	合计	占总收入%
1927	2062	174.19	136.545	180.965	491.64	23.8%
1928	2005	167.62	143.026	206.592	517.238	20.9%
1929	1826	178.899	147.649	168.375	494.921	27.1%
1930	1596	174.546	146.888	121.427	442.859	27.8%
1931	1531	163.683	138.914	152.018	454.621	29.7%
1932	2045	148.266	140.74	397.378	686.384	33.6%
1933	2331	166.471	178.822	521.122	866.415	37.2%

——见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华民国 37 年 4 月版《日寇侵华秘密内幕》第 53 页。

这种异乎寻常的高军费支出，使日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仅以 1930 年为例，陆军即拥有 720 辆坦克、600 架飞机、1184 门火炮，并新扩建了 2 个空军联队。在 “ 九 · 一八 ” 事变前，还新增设了拥有 472 架陆基飞机和 329 架舰载飞机的海军航空兵。日本政府这种全力以赴地加强武装力量，取得了显著成效，到 “ 九 · 一八 ” 事变前夕，日本已拥有一支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 25 万大军，排列在世界强国的前 5 位。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大搞 “ 非正规军 ” 的训练，以满足扩大侵略战争或补充部队的需要。1925 年以后，在日本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实行军事训练，为加强学校的军事训练，将裁减下来的军官全部分配到全国公、私立的中学和大学去担任军事教官。据 1928 年的资料统计，在日本 500 万中等和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等学校的学生中，有 140 万受过军训。同时，日本政府对一般社会青年也普遍实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在各地建立许多青年训练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经吹嘘日本的这种教育和训练制度，可以使其掌握“ 20 余万现役军人、300 余万复员军人、5—60 万大中学生和 80 余万青少年。 ”

在大肆扩军备战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即开始积极制订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方案。早在 1929 年 7 月，就由当时的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接着，关东军的另一名参谋佐久间亮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后，于 1930 年 9 月起草了《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1931 年 5 月，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具体策划下，又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了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自行决定占领满蒙之决心。关东军在研究制定各种武装侵占东北方案的同时，即展开了武力占领东北的军事部署。从 1929 年开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便以“ 旅行 ”的名义，曾先后组织了多次对东北各地的战略侦察。

1929 年 7 月 3 日至 12 日，由板垣、石原率领数名参谋人员到哈尔滨、长春等地研究了“ 攻击哈尔滨和防御海拉尔的问题 ”。7 月 4 日，石原到达长春时，还专门以《对现代战争的观察》为题作了讲演，提出了就“ 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进行研究 ”的提案。因此，在战后，石原的长春之行就被称之为揭开了“ 满洲事变前史 ”的第一页。7 月 5 日，石原在由长春至哈尔滨的途中，又提出了日本扭转“ 国运的根本国策在解决满蒙问题案 ”。1929 年 11 月，石原等人又到辽西地区，研究了在锦州附近作战问题，并在制定了“ 夜袭弓长岭的现地研究 ”和“ 攻打奉天城之要领 ”后，又开始进行新民屯渡河、向锦州方面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之研究。1930 年 5 月，日军参谋本部派人与关东军的参谋人员一起在奉天、长春等地作了一次现地战略侦察，以进一步研究、落实以武力占领东北的军事计划。另外，从 1931 年初起，关东军司令部特意将每星期六研究东北问题作为一项制度，主要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完善和修改其侵占东北的军事计划。

1931 年 4 月，日军军部调驻仙台的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的第 2 师团，代替京都第 16 师团到中国东北换防。这个师团的士兵大多是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的，因而特别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6 月，日本召开军制改革会议，7 月 1 日，陆军省即发表了一项声明：增加 1 个师团到朝鲜，将中国东北驻军由轮换制改为永久制。日本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对这一改革的说明是“ 完全为了用兵作战之目的。 ”另外，为了适应未来的作战需要。1931 年 8 月 1 日，日本军部还进行了人事调整：任命本庄繁陆军中将为新的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可说是个侵华老手、有名的“ 中国通 ”，曾任过张作霖的顾问，对东北的各方面情况非常熟悉。8 月 3、4 日，他由板垣陪同出席了驻朝鲜日军、关东军、驻台湾日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于 8 月 20 日到任。此外，原任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大佐，8 月 18 日被任命为驻奉天特务机关长。“ 九 · 一八 ”前，此人曾在中国居住 18

年，被视为日本陆军内部的“中国通”。对于“事变”的发动，特别是对于“事变”后伪满洲的建立，土肥原都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在此东北形势日益紧张的关键时刻，日本军部任命此二人，可说是用意颇深。

1931 年 7 月，关东军的情报机关在侦察到攻占奉天须用大炮时，便决定从国内秘密运来 2 门 240 毫米大口径榴弹炮和数门 280 毫米的要塞炮，置于独立守备队兵营内。为了掩盖他们将要发动武装侵占东北的阴谋，关东军在运输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把炮身装进外形似棺材的大木箱里，指定必须用客船从神户运往大连，到大连码头后，直接卸到地下室。并令其士兵穿上中国人的衣服，装成当地的码头工人进行搬运。随后，在进行大炮的安装时，为挖大炮的掩体，因须挖一条约 5 米长、深 1 米的沟，日本人还欺骗当地居民说，他们是在挖游泳池。为了保证射击精度，日本人还派关东军士兵化装测量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附近的射击目标。并在事变前把炮口对准射击目标：北大营和飞机场，以便实射时闭着眼睛也能命中。经过一番周密配置，到 9 月 10 日安装完毕。后来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夜里，这些巨型重炮果然发挥了作用。

8 月 27 日，日本南满铁路守备队由大连秘密开赴苏家屯、奉天车站一带。另外，8 月下旬，关东军还从国内紧急调运飞机 30 架、野炮 20 余门至苏家屯车站附近。在此期间，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亦同时举行军事演习 2 周。特别是对铁路守备队的步兵进行了操作大炮的训练，并预先就各个“攻击目标”的位置在炮身上做上记号，这样在实际射击时，只要把记号与标尺配合起来，就可完全命中目标。

就在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加紧准备的同时，驻朝鲜的日军为了支援关东军作战，在 1931 年 8 月中、下旬，也曾多次在图们江进行越界架桥和在江中施放水雷的演习，甚至越界过江在中国境内埋设地雷，步兵也越过图们江在中国境内进行散兵演习。此外，在正规军加紧训练的同时，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也于 9 月 8 日接到密令，要求分别集中到奉天、长春、哈尔滨报到。

为了在“事变”发生后，日军能够迅速及时的调运，9 月 14 日，驻抚顺日军第 2 中队长川上大尉召集了一个警备会议，出席的有警察署长、宪兵分队长、在乡军人分会长（兼防备队长）、大官屯和抚顺两车站站长。会上决定了两项绝密事项：（一）为了保证驻抚顺守备队在突然事变发生时进占奉天，要求大官屯、抚顺两站长从即日起，每晚必须准备好夜间可以随时出动的 4 辆编组的列车；（二）“事变”发生时，驻地安全秩序，由防备队、警察和宪兵协助维持。

一切准备就绪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关东军还频繁举行军事演习。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0 年 10 月至 1931 年 7 月，日军先后在沈阳等地进行的军事演习共计 50 余次，参加人数达 7000 余人次。9 月 2、3 日，日军整天在北大营附近之旺官屯、关帝庙、老瓜堡等地进行野外演习。9 月 4 日

至 5 日，日军又先后举行包围东北兵工厂和沈阳城的攻击演习。9 月 8 日，日军竟然在沈阳北门外架起机枪，作攻城演习，并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随后还接连不断搞一些城市边沿战、夜战和拂晓战等有针对性的演习。9 月 14 日至 17 日，日军在北大营一带连续进行实战演习，有一次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17 日，竟有两名日本警察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真可说是嚣张至极。

8 月 20 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一到任，就频繁到南满铁路沿线各日军部队进行所谓的“巡视”，实际上是到处作战前动员。9 月 7 日前，本庄繁到大石桥、鞍山等地日军部队。9 月 8 日到奉天，在石原的陪同下，访问日本奉天总领事馆的林总领事，并就当前时局交换了意见。9 月 12 日到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9 月 13 日在离开长春前，对所属部队发出训示，宣称：“铁道守备队要保护帝国居民的安全……。”9 月 18 日上午 9 时，本庄繁到驻奉天的第 2 师团司令部“检查工作”，最后对该师团多门二郎师团长说：“目前满蒙的情势日益不安，我军不能一日苟安，万一发生事变，各部队应积极行动。因此从现在起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下午 14 时，本庄繁一行结束“巡视”，从辽阳急切地回到了位于旅顺的关东军总司令部。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侵略军在疯狂地进行战争准备，“事变”即将发生，当时的东北业已是处于战云密布，一触即发的战争前夜了。

四、制造战争借口

日本帝国主义既然已经决定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并且已经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便开始制造种种挑衅事件，以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寻找借口，制造舆论。而“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便是日本人在“事变”前所制造的两个主要借口。

万宝山位于中国长春市以北约 30 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既非“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 1909 年签订的《中日图江界约》所定的特区，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1931 年 4 月，“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用土地 500 垧（约 7500 亩）。租约最后一条规定：如县政府不准，则该约仍作无效。但郝永德却未待县政府批准，就擅自把上述土地转租给由于日本侵略而丧失土地后流落到中国的朝鲜族农民团李升薰等 9 人。为了引水灌田，李等 180 余人在万宝山附近的伊通河上截流筑坝，并挖了一条宽、深各约 3 丈、长达 20 余华里的引水渠。这条水渠把沿途经过的当地中国农民开垦多年的熟地截为两段，并占用许多土地。而且一旦截流引水成功，位于河流下游的中国农民 2 千多公顷（约 3 万亩）土地，就有可能被淹没。为此，当地农民派了 100 多名代表，要求长春县政府出面制止李升薰等人的非法活动。5 月 31 日，长春县派警察到万宝山屯，命令李等人立即停止挖渠筑坝。但就在中国警察刚到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也派来了日本警察到现场干涉。这些日本警察支持和怂恿李升薰等人的作为，威胁和压制中国农民。中国地方当局为避免纠纷，便与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交涉，要求日本人停止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可日本领事田代重德不仅蛮横无理地完全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反而又引来了大批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帮助李升薰等人加紧挖渠筑坝。为了保护这种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非法行径，日本领事馆还派了五六十名便衣警察，携带机枪到万宝山地区，准备镇压中国人。7 月 1 日，500 余名忍无可忍的万宝山农民，自发地集合起来，填了李升薰等非法挖掘的水渠。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当即向中国农民开枪。第 2 天，日本方面又增派了 40 多名警察来到这里。就这样，在日本警察武力保护下，李升薰等又恢复了引水渠的开挖。并于当月 11 日通水。

在这场冲突中，中国农民有多人受伤，而日本警察和朝鲜人并没有人受伤，但是，存心制造事端的日本侵略分子，当然不会放弃这一“千载难逢”乘机出兵“北满”的好机会。事件发生后，日本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和朝鲜各地捏造事实，鼓动排华、仇华运动。另一方面立即派出以侵华狂热分子森恪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调查，实际上，森恪此行，名义上是调查，但真实目的却是想找到一条“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如何利用此次事件来落实“武力占领东北”的既定方针。因此，森恪等人在出发前就同日本军部进行了协商，到东北后，在各地都受到日本宪兵队的迎接，并替森恪等人充当向导。森恪等人回到日本后，即大肆煽动立即“乘此有利时机”出兵中国东

北。7 月 22 日，中日双方开始就此事进行谈判，但由于日本人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完全是想利用这一事件为出兵找借口，因此使谈判毫无进展，一直到“ 九 · 一八 ” 事变爆发，谈判也就自然停止了。

在“ 九 · 一八 ” 事变爆发前，日本侵略军蓄意制造的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大兴安岭地区中国边防军处死日本军事间谍为导火索的所谓“ 中村事件 ”。

日本自从确定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 根本国策 ” 后，就不断向各地派遣间谍，进行各种军事侦察活动。在“ 九 · 一八 ” 事变前夕，随着发动军事进攻的时机日益迫近，日本派遣军事间谍的活动更是显著增多。“ 中村事件 ” 发生的大兴安岭地区，是日本人派遣间谍的重点地区之一。

1931 年 5 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的情报员中村震太郎大尉，奉命到大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他率领退伍骑兵曹长（上士）井杉延太郎、一名担任向导的蒙古人和一名白俄罗斯人，假冒“ 黎明学会干事农学士 ”，假装农业专家并化装成中国人的模样，从海拉尔出发，至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侦察活动。6 月 27 日，在准备经洮南回国的途中，被驻防当地的屯垦军第 3 团逮捕。第 3 团的官兵在掌握了中村等进行间谍活动的确凿证据后，便将中村等秘密处死。

本来按照国际惯例，主权国家完全可以处死敌国的间谍。中村等人不仅作为军事间谍的罪证确凿，而且是在中国政府明令禁止进入的边防军事要地被逮捕的。因此，中国边防军将他们处死，完全是正当的行为。然而，正在千方百计制造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借口的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放过这一大好机会的。

日本政府在 7 月中旬得知中村被处死后，立即隐瞒了中村等进行间谍活动的真相，在国内公布他们被处死的情况。然后，一方面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还动员各种组织、机构，利用一切机会，尽量渲染，故意扩大事态，宣传所谓的“ 满蒙危机 ”，煽动战争狂热。在 8 月 20 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陆相南次郎在谈到中村事件时，提出要求中国方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9 月 8 日，日本内阁会议专门讨论“ 中村事件 ”，会议一致同意：“ 以中村事件为由，首先进行铁路交涉，进而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会后发表了许多强硬的意见。当时正在东京活动的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声称“ 奉天政府即便承认这个事实，但如不表示诚意，或者玩弄拖延谈判手段时，我们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 ” 关东军参谋、“ 九 · 一八 ” 事变的具体策划者石原莞尔说：“ 中村事件只不过是新增加的一个悬案，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 ” 并明确提出了利用“ 中村事件 ” 扩大事端，以武力解决“ 满蒙 ” 问题的建议。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同以前所有的“ 事件 ” 一样，这一次日本人也是蓄意扩大事端，以乘机实现其完全占领中国东北的“ 根本国策 ”。

五、“九·一八”事变爆发

沈阳市地处东北平原的南部，位于辽河平原中部、浑河北岸，它是连接关内和吉林、黑龙江、内蒙以及连接朝鲜各铁路干线的枢纽。它东靠煤都抚顺，南为钢都鞍山和煤铁之城本溪，西临动力煤基地阜新，是中国矿物原料和动力原料极其丰富的中心。此外，沈阳的战略地理位置也很重要，早在2100年前，它就是关外的一个边防要地。公元1621年，（后）金太祖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后，因考虑到沈阳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当时的都城，称之为“盛京”。“九·一八”事变前，国民党东北军阀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最高行政机构大都设在沈阳。1931年春，关东军制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就在原则上规定了“在满蒙采取军事行动时关东军必须集中于一地”。他们认为：“应使关东军主力迅速集中于奉天，以便先发制人，待将敌之最精锐的奉天附近的军队，加以歼灭。即能控制东北四省之中枢。”而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关东军就选择了距沈阳东北军的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沈阳与文官屯之间）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一段作为爆破地点。

早在1930年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就准备把柳条湖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1931年春，板垣等人即制订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初步方案。1931年6月底，又进一步制订了在柳条湖制造事端的详细计划：规定第一期军事占领的范围即为“以满铁线的长春及其以西250公里的四洮路的洮南，长春以东100公里的吉林，以及吉林以东150公里的敦化为界限。这大体上相当于整个东北的三分之一的南满地区。”时间预定在9月28日，并要求在柳条湖爆炸铁轨的同时炮轰北大营，实施“闪击战”，一夜之间占领奉天全城。

9月中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为避免节外生枝，关东军便决定把原定的28号提前10天。因此，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为图谋中国东北所一手制造的“柳条湖事件”，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晚上爆发了。

当天沈阳的天气异常晴朗，白天平静无事。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所属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北大营以南约六七百米的柳条湖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巨响，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这就是“柳条湖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侵略者采取贼喊捉贼的一惯伎俩，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北大营发起了全面攻击。在“事件”发生后不到1个小时，即1931年9月18日夜11时18分，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就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此时土肥原正在从东京返沈阳途中）的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和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内称：“十八日午后十时半左右，于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两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某部发生冲突。”紧接着又于19日零时10分发出第二封电报捏造说：“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我南满铁路，其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